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四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一〇期 ——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6f)

【童年旧事】	我所记得的农村“文革” ——祭《五·一六通知》发布四十周年	张德元
【案例分析】	文革后“记忆改造工程”的成就 ——张德元教授农村文革回忆文章读后感	老田
【追根溯源】	毛发动文革，生前防篡权，死后防鞭尸	张显扬
【春秋史笔】	反思文革认清极权专制的本质	胡平
【学术争鸣】	伪劣的文革史与误入歧途的文革反思	刘国凯
【一家之言】	趁机造反——纪念文革爆发40周年	郑义
【各抒己见】	“人民文革”不存在	元旦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童年旧事】

我所记得的农村“文革”
——祭《五·一六通知》发布四十周年

• 张德元 •

明天就是2006年4月的最后一天，“红五月”就要来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创举”都是与“红五月”有关的，“红五月”注定要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1966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从此“急风暴雨”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横扫中国大地，历时十年之久。我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文革“洗礼”中度过的。时光如梭，弹指间《五·一六通知》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在那非常时期所经历的一些事仍历历在目。今天，我这个“可被教育好的”的“黑五类子弟”已经被枉称学者了，就想在这《五·一六通知》发布四十周年之际对我通常不愿提及的那些往事做些客观、理性的回忆，这就算是我送给“红五月”的礼物吧。

◇ 阶级斗争与农民的善良

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常抓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毛主席的语录中就有一条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按照当时的说法，之所以要抓阶级斗争，是因为“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非对这些“敌人”进行斗争不可。我所见到的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就两个方面，一是对“阶级敌人”进行精神打击，开批判会批判他们，让这些敌人交代“罪行”，使他们在社会上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二是对“阶级敌人”进行肉体打击，包括对他们进行捆绑、关押、游街等。需要跟现在的孩子们说清楚的是，这些打击方式在当时是无产阶级的“天赋”权利，是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的。

我就出生在那种被称为“阶级敌人”的家庭里，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就目睹了无数次针对我父亲的“斗争”，虽然父亲并没有“乱说乱动”，但“贫下中农”还是不能饶恕他的“历史罪行”。最初的记忆，就是在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只有四五岁的样子；父亲被捆绑着、戴着纸糊的帽子，一群人押着父亲、呼喊口号从我家门口走过；母亲关上门，我和母亲从门缝里向外张望，母亲以泪洗面，我则十分害怕。此后，象这样的“斗争”每年都要进行许多次，因为当时的政策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每次父亲将要被“斗争”之前，都会有当时被称为“贫下中农”的、“出身好”的农民来向我父亲通风报信；在“斗争”现场，“贫下中农”们都对我父亲表现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可“斗争”一结束，这些农民们又偷偷地跑到我家来安慰我父亲。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年，不知道是什么“运动”又来了，我的父亲、母亲都被关到“民兵指挥部”，在那段日子里，我和我哥这两个“阶级敌人”的孩子就是依靠“贫下中农”的关照才度过来的。在没有“斗争”的平时，乡亲们也并不把父亲看成“敌人”，他们仍然按照乡村的习惯称呼父亲为“大伯”、“大叔”，甚至称他为“先生”——父亲算是乡村的知识分子。给人的感觉是，农民们在阶级斗争运动中好象是在演戏。按照我们现在的学术语言来讲，就是农村的“阶级斗争”是嵌入式的。

象父亲这样的“阶级敌人”被称为“历史反革命”，意思是因他曾经为国民党政权服务，而被界定为“敌人”。有些“贫下中农”也可能一不小心而被界定为“敌人”——“现行反革命”，我们的一个邻居就稀里糊涂地由“贫下中农”的一分子一下子沦为“阶级敌人”。文革中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处都是毛主席像，家家户户都要“请”毛主席像。说实在的，不管上面搞个人崇拜是什么意图，但农民对毛主席的崇拜一般是不掺假的。我家的这个邻居也是这样。我家的这个邻居家庭相对较困难，但他看到别人家都有了毛主席的石膏像供奉在厅堂上，觉得自己也应该想办法把毛主席“请”到家；于是他上山打了一担柴，挑到十多里外的镇上去卖了钱，当即在镇上“请”了毛主席的石膏像；往回走时，他觉得石膏像不好拿，就用挑柴的绳子栓住“毛主席”的脖子，用扁担头挑在肩上，这样走起路就轻快多了；他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举动已经亵渎了“伟大领袖”，结果就“理所当然”被定为“敌人”了；他一再向人们表示，他是无意之举，他对毛主席是绝对忠心的，为了表达他的忠心，他在公社门口，光着膀子，在自己的皮肉上别上毛主席像章，鲜血直流；他以为这样，毛主席老人家就能原谅他了；可是，他还是没有逃脱被“打击”的命运。按照当时的文革语言，这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 割不完的资本主义尾巴

在那个年代，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必然是公有制的，资本主义必然是私有制的。按照这个逻辑，维护公有制就是维护社会主义，“一大二公”才是人民公社社员们应该想的，一切私有观念或行动都是非社会主义的，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割资本主义尾巴成为文革时期农村经常性的“革命”任务，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关系到是否改变社会主义江山颜色、红旗是否落地的大

事。

割资本主义尾巴首先是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他们“斗私批修”，从世界观上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公有制的优越性，这就是所谓“路线教育”。希望通过这种教育，让农民们不再为自己打算，一心一意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农民们白天干活，晚上就参加政治学习，上级还派工作组到生产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农民们“提高认识”。这期间还广泛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以强化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这资本主义尾巴年年割，却怎么也割不完。尽管上级发狠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农民们总是表面上应承，暗地里还是喜欢“资本主义的苗”。农民们总是在和工作组或公社干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有机会就去搞他的自留地，一有机会就去搞他的家庭副业，一有机会就去“挖社会主义墙角”。农民们可能趁你不注意，在公共空地上偷偷种上几颗南瓜秧，也可能有事没事地在自留地边修修铲铲，悄悄地蚕食公地，“渐进”地扩大他的自留地范围；也可能以请假走亲戚为名跑一趟小生意。农民总是在骨子里和人民公社离心离德。人民公社为了把资本主义尾巴割好，不仅对农民进行教育，也采取行政措施，甚至是专政手段。为了防止农民做小生意，成立了“打办公室”——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设立“检查站”，有时也把抓获的“投机倒把分子”当“阶级敌人”一样批斗、游街。也可能把不愿意参加集体劳动而干私活的农民当作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坏分子”进行“斗争”。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农民们总是想尽各种办法保护他的“资本主义尾巴”。结果，资本主义尾巴年年割，就是割不完。

这几年，我在研究农村产权制度时，常常想起当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慢慢地我明白过来，实际上，今天的“大包干”就来源于当年的“资本主义尾巴”。

◇ 学工学农学军

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印象最深的是，为响应毛主席号召，不断地学工、学农、学军。客观地说，文革中的教育普及确实是做得很好的，甚至可以说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而且，学费十分便宜，不存在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的问题。但是，我们那时的学校生活是很特别的，几乎不怎么学习文化课，整天搞“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学工、学农、学军。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是毛主席讲的；那工人阶级当然是学习的榜样了。同时，农民又是革命的同盟军，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就理所当然了。人民解放军是“革命的大熔炉”，且我们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一定要解放台湾”，那当然只有“全民皆兵”。可见，学工、学农、学军都是有理论根据的。

学工就是叫学生到工厂参加劳动，向工人师傅学习；学农就是到生产队干活，向农民学习；学军就是组织学生过军事化生活，向解放军学习。客观地说，这种学习方法确实给我长了不少实践知识，也锻炼了意志，这对我后来的成长是有帮助的。但问题是，这样学下来，到我初中毕业时，文化课知识不及现在的小学水平；我至今还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了考试制度，学校兴起“补课热”，从哪里补起呢？我们这些初三学生竟然是从有理数加减乘除补起。

现在，我们又要讲教育改革了，究竟怎么改我不敢讲，但是，我想我写的这段文字或许能对教育改革政策的制订者们有所启发。

◇ 文革中的新鲜事

现在，当我们谈到文革时往往称之为“十年浩劫”，不可否认，文革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伤害确实是存在的，对农村、农民的伤害也是存在的。但是，根据我的记忆，文革中的农村也出现过许多新鲜事，当时称之为“新生事物”。这些新生事物的有些内容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就是在今天也可能有借鉴价值。

一是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劳动，给农民带来许多新信息，农村的小学校也不愁没有教书先生了，文革中的教育普及与此有关，我就是沾了这个光，才上的小学。大批的城市干部、医生下放农村，我们家乡的乡镇卫生院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我们公社的卫生院是当时的示范卫生院，能做大手术，在当时的皖西地区名噪一时。卫生知识普及、卫生防疫也都是这个时候搞起来的。文革结束后，“返城”运动就开始了，农村教育、卫生事业都因此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二是赤脚医生。文革中，每个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都通过速成和土法上马的办法培养了属于自己的赤脚医生，建立起大队医务室，并以集体经济为依托构建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以讲，现代医学知识普遍地、大规模地进入农村就在这个时候，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功不可没。大包干后，集体经济解体，合作医疗制度崩溃了，但赤脚医生留了下来，他们转变为今天的乡村医生了。这么说来，我们今天仍然在吃文革的遗产。

三是科学种田。文革中，大力提倡科学种田。改变农民传统、落后的种植习惯，代之以科学种田知识的普及，农技推广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大规模实施的。我至今还能记得，当时的公社干部推广“合理密植”和宣传“农业八字宪法”的情景。在我家乡普遍推广双季稻，引进种植紫云英——农民称之为红花草，以绿肥替代化肥。大包干后，双季稻和紫云英都被废弃了。

文革中的新生事物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上面的新生事物实际上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资源下乡”，“资源下乡”对促进当时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了，是不是也要搞个“资源下乡”运动呢？

◇ 少年的心

文革中的许多新生事物给农村带来阳光，但是我所能沐浴的阳光总是比别人少，相反麻烦却比别人多。原因是，我是“黑五类子弟”。

当我还是个八九岁孩子时，一次，我发现路边有棵小树长了个杈杈，很适合做个弹弓，我就把它砍了下来；这下可坏了；上头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硬是定性为阶级敌人唆使孩子破坏“植树造林”，结果我和父亲都倒霉了。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在我身上发生。小学毕业时，我又没有被“推荐”上初中——那时升学是不考试的，我的父亲通过同学关系才把我勉强“争取”到另一个公社的中学就读。这些事情，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后来，听人讲，党的政策是“讲成分不唯成分论”，我想我有争取和别人“一样”的机会了，所以在上初中时，我努力“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我被树为“可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弟”的典型，成为六安地区表彰的“优秀红卫兵”，被允许加入共青团。加之我从小就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少年时期就“官运亨通”了，先是担任团支部书记，后是团总支副书记，公社贫协委员。可就是这样，我最怕的事情还是“填表”，因为每次“填表”我都能够感觉到我跟别人“不一样”。好不容易文革结束了，说是以后升学凭考试，我想这下我该和别人“一样”了。可是好事多磨。我努力学习，升学考试分数很高，比当时的中专分数线高许多，按说可以跳“农”门了。但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我仍然要被严格“政治审查”，“政审”的结果，

我不仅没有上成中专，重点中学也上不成，甚至也没有普通高中录取我。我在家等啊等，一直等到人家高一期末考试时，一个山区普通中学终于给我送了个通知书。不明不白地，高中又比人家少上半年。我还是跟人家“不一样”。

少年的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跟别人“不一样”的痛楚，这种痛楚就是我今天呼吁三农的动力。我的理想就是，有生之年要尽自己的力量促成有朝一日农村和城市“一样”，农民和市民“一样”；无论前进道路上还要吃多少亏，也无怨无悔。

~~~~~

## 【案例分析】

### 文革后“记忆改造工程”的成就 ——张德元教授农村文革回忆文章读后感

· 老 田 ·

看来人们的知识，以及体现为知识系统一部分的历史记忆，是可以按照特定需要进行改造的，在阅读张德元教授关于文革和阶级斗争的文章时，这个感受尤其强烈，以至于我最终打算把感想写成文字。

由于缺乏适当的理解框架，当然也许是由于我阅读范围的局限未能发现有用的知识积累，因此我不得不把自己的分析工作，建立在毛泽东的判断基础上——把认识层面分成“红”（政治性认识）和“专”（技术性认识），一个人的知识或者认识最终要受到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的限制。人的认识，一个方面是由自身利益诉求而形成的视野局限，或者表述为立场（即看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是认识的政治方面；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前人认识的积累和传承，这是知识的技术方面。相比较而言，在认识论方面，今天人们很重视认识的技术性方面，把认识的政治性方面轻视到可有可无的地步。

就个人知识的取得和积累而言，政治性方面的重要性即使不高于技术性积累，也决不低于它。而且，认识的政治性方面由于受到利益实现方式的博弈性质所决定，具有结构性特点，在历史上曾经呈现出周期性重复的特征，成为人们认识形成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人最重视超越个人利害关系约束的重要性，甚至提出“去私欲之蔽、见天理之明”的认识论口号。而记忆改造工程之所以能够成功，按照老田的理解，主要不是在技术性知识积累或者创新方面着手，因为历史史实一经发生就无可追回，但是对于利益实现的重新厘定，或者换句话说，记忆改造工程可以在重新建立的“政治统一战线”中间去实现，这是可以在事后进行安排的。基本的逻辑是：在给予利益的前提下，由更改认识的政治性方面，去否定或者重新界定认识的技术性方面，认识是在新的政治认同基础上被“接受”的，而不是被技术性地“说服”的。也许认识的政治性方面对认识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的存在，才使得技术性方面的记忆改造工作得以进行。

张德元教授在农村问题研究上，较少追随那种“拿着西方真理批判一切”的“主流治学捷径”，更多地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在主流学风极端浮躁的今天，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但是就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而言，张德元教授的认识明显与已有的历史文献记载不符，而是与文革后“被改造的记忆”一致，由于此种现象在中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状态，也由于老田在这个文革和毛泽东研究方面下过几年功夫，就以张德元教授的文章“我所记得的农村‘文革’——祭《五·一六通知》发布四十周年”为例，做一个现象案例分析。

对于文革和阶级斗争，张德元教授根据自身的记忆，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常抓

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毛主席的语录中就有一条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按照当时的说法，之所以要抓阶级斗争，是因为‘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非对这些‘敌人’进行斗争不可。我所见到的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就两个方面，一是对‘阶级敌人’进行精神打击，开批判会批判他们，让这些敌人交代‘罪行’，使他们在社会上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二是对‘阶级敌人’进行肉体打击，包括对他们进行捆绑、关押、游街等。需要跟现在的孩子们说清楚的是，这些打击方式在当时是无产阶级的‘天赋’权利，是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应该说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把这样的阶级斗争进行方式与毛泽东联系起来，就与历史文献依据相反了。

文革初期，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建国后的阶级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动”，在这个认识的背后，实质上新政权的颠覆力量来自何方？是来自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还是来自新社会中间新生的精英阶层？换句话说，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要向下指向“黑五类”，还是“向上”指向“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高干子弟组成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提出“血统论”对联，认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把文革的方向从对准“当权派”转移向“老的剥削阶级”及其后代。张德元的记忆，实质上与新中国的强势群体的政治意向相关，而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指向根本相反。如果说在“土改”和“合作化”阶段，毛泽东所强调要建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夺取旧的剥削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领导权，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专政对象确如张德元教授所理解的，但是文革的对象则恰恰反过来，是指向社会的上层和共产党内部，在经过一九六三年五月的四清“前十条”，一九六四年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后十条”，以及一九六五年初的“二十三条”的系列争论，文革的对象已经锁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不存在任何模糊和犹疑之处。

文革中间阶级斗争的“大方向”往往被转移为指向“黑五类”，虽然明显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意志，但是却符合官僚精英群体的整体利益，他们把打击矛头指向黑五类之后，自己就逃脱了被追究的厄运。即便是在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仍然说“炮打司令部是炮打牛鬼蛇神，不是炮打湖北省委。”“先触及一下那些老寄生虫，再保他们过关。”毛泽东亲手制定的政策，就这样被官僚精英群体按照自身的利益和意愿“过滤掉”了。按照美国迈斯纳教授的分析，不同的阶级概念中间蕴含的是不同的利害关系：“共产党官僚主义的自身利益而言，最适宜的方式是把本来属于他们但现在已不存在的革命时期那些社会阶级的‘阶级成分’安在自己头上，而不是承认新社会具有产生新阶级分化的可能性。在理论上，这可以很方便地通过马克思主义关于只能按照生产进程和私有财产所有制来划分阶级这一狭义的阶级定义作出一个大致的解释。由此出发，产生了共产党的一个普遍的正统观念（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首次系统阐述）：在一个已经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不可能再产生新的剥削阶级。”（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一〇月第一版，p 406）“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前几年，毛泽东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迄今任何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敢苟同的。毛泽东现在确信，社会主义会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社会主义转变’的主要障碍不是过去的资产阶级残余，而恰恰是现在的官僚主义者，是那些从前的革命者，革命使他们变成了统治者，他们凭借政治权力支配着新社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占取了大量社会劳动的果实。有时，毛泽东是相当明确并非常坦率地提出这种观点的，例如，在一九六五年，他就谴责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还毫不犹豫地指出了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或他们的领导人的地位和来源。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他指控说，他们就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上，p 408）把新中国的阶级关系固定到旧社会的剥削阶级身上，不仅是官僚精英群体出于自保的需要，也迎合了干部子弟的优越心理，所以当权派和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一拍即合，但是确实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指向无关，张德元教授虽然没有硬指是毛泽东要这么干的，但

是却不加区别地把相互对立的阶级分化认识“一锅煮”了。不管张德元教授是出于自觉，还是出于疏忽，由于他过分强调了自身的感受以及在技术性认识上不恰当地联系了他所熟知的一条“毛主席语录”，在后果上确实佐证了“记忆改造工程”的成就。

而毛泽东的看法和政策被歪曲，与其说是官僚精英群体对于旧剥削阶级的担忧和恐惧，毋宁说是寻找一个方便的借口以清算“造反派的造反行为”是“右派翻天”，在没有真正的造反派可资清算的大多数农村地区，清算旧剥削阶级和黑五类就成了地方官僚“紧跟政治形势”的唯一表现手法了，这一点迈斯纳也看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规定按照政治行为来确定阶级，而现在他却对站在旧路线上的官僚主义者作出了妥协，后者认为，强调社会阶级出身在政治上十分有利。这样，调查组受命不但要审查被审查对象的政治历史，还要审查他与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可能有的社会关系。为了适合当时的政治潮流，对于知识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激进组织的领导人的审查清洗十分严厉。据观察，保守派的政治领导人对‘清理’运动的反应十分热烈。一般地说，整顿运动是从干部扩大到群众，许多人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受到了各种形式的迫害和歧视。过去的社会出身如今再次成为进行政治判断的标准，家庭历史不那么纯洁的人成为与其在政治上或个人关系上有宿怨（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大量的新的仇恨）的其他人的嘲弄对象。”（p 458）相比较而言，清算造反派是文革后期按照力量对比不利于造反派的现实，所进行的一场“秋后算帐”的政治博弈，目的是落实“造反无理”的信条，特别是在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间，全国有超过1000万造反派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份子”，完成了系统清算造反派“造反行为”的政治功能，而作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也就是文革初期保守派所主张的“阶级关系不变论”或者“血统论”，张德元教授童年时期被“阶级斗争”运动无辜波及，并非毛泽东所强调的那一种“阶级斗争”，而是在“反文革力量”清算文革积极分子的运动中间被殃及池鱼的，是“打着B52旗号以打击B52力量”这一政治策略的结果。

在文革期间所发生的个人崇拜问题上，明显有两个非常不同的阶段，其政治内涵完全相反。第一个阶段是在文革的发动时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其目的是矮化一切“非毛泽东思想”，从而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单一的思想资源，扩张为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并占据绝大部分领地，这样，与此不同的思想资源的指导作用和影响就被急剧地压缩了。按照毛泽东本人的总结，这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此时拔高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是为了给“造反有理”正名，为群众突破各种思想藩篱的压制开辟道路。而在文革的群众运动的终结时期，继续推广“个人崇拜”，目的是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把肯定毛泽东思想主要不同于其他思想资源的部分——特别是“造反有理”的精神取消掉，目的是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和取消造反行为的“合法性”，为进行“秋后算帐”作舆论准备。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则从强调“造反有理”转移到强调通过仪式来显示对毛泽东个人“忠诚不忠诚”的表演上，“仪式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通过“早请示、晚汇报”来宣誓要“三忠于”“四无限”、大量印发毛泽东的著作、制作“像章”“塑像”、搞“忠字舞”、“宝书台”等等。笔者小时候就亲眼见到老家很多农民在今天堂屋放祖宗牌位的地方，布置了“宝书台”以放置《毛泽东选集》。文革后期的“仪式化运动”，和文革初期的“高举旗帜”一样，也是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不过这一次的政治内涵则完全相反，是体现当权派的政治意志，目的是充分利用当权派实际掌握国家资源分配能力的优势，通过比对手更能在“仪式化”方面表现得更多更好的方式，去“垄断”毛泽东思想解释权。张德元教授的记忆，是一个盲目跟风的农民的一次谈不到任何政治竞争目标的“失误行为”，以及由此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张德元教授所回忆的现象，在浅层次上是足以支持“记忆改造工程”的样板材料，但是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毛泽东思想仪式化”运动，却不是出于跟风农民偶然行为的简单相加，而是经过强势群体的精心选择和大力推动的结果，其内在深刻的政治博弈内涵，因为被“记忆改造工程”给抹杀了，由于“记忆改造工程”必须掩盖和遮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造神运动”背后的政治内涵，最重要的理由不能呈现给今天的人们看，所以那些高人们今天只好说，那个时候人们都发疯了，丧失理智了，都不会思考问题了。实际上，逻辑上可能

恰恰反过来，丧失理智思考和分析能力的，是今天的那些高人。

今天许多人都经历过毛泽东的建设历程，许多人还是作为劳动者长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的，今天青年人和他们的父辈相比，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方面都有着巨大的落差，几乎没有例外，照理说人们在经济建设方面最不容易受到“记忆改造工程”的影响，但是恰恰相反，我们看到这个方面的历史记忆歪曲相当成功。文革后为了给毛泽东确立一个“只会搞阶级斗争”和空谈“政治挂帅”的形象，宣传上特别突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两个口号，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应该记得，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而不是“割资本主义尾巴”，至于“宁要草不要苗”的口号，我本人当时则闻所未闻。在“深揭狠批”四人帮时期，说这两个口号都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具体化，虽然全部批判文章都没有提供“宁要草不要苗”的具体出处，但是批判工作的力度很大，其宣传成就是这两个口号几乎成为今天人们把握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的主要线索。

从国家管理的权责分工看，四人帮从未具体负责过经济建设方面的领导工作，在文革期间他们主要是把持“两报一刊”等舆论阵地，同时与一些“写作组”关系相对密切，显然追踪四人帮的极左影响，就有必要去考察当时的舆论倾向。有一个名叫“在锈弦上弹奏”的网友，从四人帮的权责范围内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就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人民日报》进行检索的结果是：“1950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共有393篇文章提到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中从1957年11月到1976年期间共有26篇文章提到，文章对口号持肯定态度的只有5篇，21篇是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甚至在1975年8月10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共产主义思想和现阶段的政策》中间，还出现这样的句子：“他们经常地是否定不断革命，抛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一类的反动口号，反对革命从这一阶段向另一阶段发展，反对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有时候则把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混淆起来，叫喊什么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商品生产，破坏现阶段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不论采用什么手法，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根据后来柳随年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记载，邓小平当年主持“农业要整顿”的会议，“会后，各地区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社队帮助整顿。”这个整顿工作队，根据许多当时亲历者的回忆，就是下农村去“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人民日报的文章看来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同一个网友就“宁要草不要苗”这句话检索人民日报的结果是：“‘宁要……不要……’这个句式在中国新闻报刊上出现的频率，1976年以前不算很高。以1947年至1997年《人民日报》为例，文章中有‘宁要……不要……’、‘宁愿要……’句式的共255篇，这种句式的文章涉及各方面内容，尤其在涉及国际关系方面更是经常出现，但是，1976年以前不到二十篇，大量出现是在1976年以后。”“从查阅资料看，所有有关所谓‘四人帮’‘宁要……不要……’的文章（包传记文学作品）均出自这里，与当时的教育革命形势相关，也即是说，张春桥可能确实对周荣鑫说过‘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的话。但是，因为这两篇文章也是批判时引用，并非讲（谈）话记录原文，笔者只是结合1976年5月10日《北京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那篇《调查报告》的结论判断张春桥有可能说过此话。其它诸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修正）主义的正点’、‘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等等，应属后来的人的推论或写文章的人的猜想了。1976年11月3日新华社那篇有关‘毛泽东号’机车组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中涉及的‘宁要…不要…’属引用（引用哪里的，未知）而非出处。”

邓小平曾经对人说四人帮主张“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这倒是有可能，



因为邓小平与四人帮在高层一起共过事，有许多机会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锋，有可能知道一些舆论未披露过的言论，但是一般的大批判文章写作者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看来，后来“深揭狠批运动”时期的文章，很多色彩特别鲜明的言论，是相关大批判文章作者通过强烈对比、为了给人以深刻印象而“代‘四人帮’立言”的结果。我们看到在张德元教授的文章中间，也有把从文革后大批判文章获知的言论，按照宣传的惯例附加到过去的记忆中间去了，大致上可以肯定，张德元教授是不可能在当时得知“宁要草不要苗”这句话的。

张德元教授的专业领域是三农问题，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文革和当时的毛泽东思想，问题在于：那些专职研究文革历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专家们，也没有高出“个人记忆”的浅薄层次。当然，也有可能这些专家本身是服务于“记忆改造工程”需要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出现真正的研究和反思，也正因为如此，张德元教授的“农村文革”文章，是值得提出来进行分析的上好案例材料。

二〇〇六年五月五日

~~~~~

【追根溯源】

毛发动文革，生前防篡权，死后防鞭尸

• 张显扬 •

金钟先生：

惠寄的大作《苏共二十大与中国文革》，早已拜读。迟迟未能把我的意见告您，让您久等了。

今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文革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一件大事。当然，不是甚么光荣的大事，而是耻辱的大事。如果有人提议把二〇〇六年为国耻年，以纪念那十年浩劫，我举双手赞成。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总结并吸取这件事情的教训，以免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

说到总结教训，首先当然要弄清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您的文章主要也是谈这个问题的。您把文革和苏共二十大联系起来考察，是非常正确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无疑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揭发斯大林的罪行，并由此开创一条中共被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赫鲁晓夫路线分不开。但是，我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不宜作直线式的推论，好像毛泽东发动文革，矛头是指向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及其路线的。

◇ 毛发动文革，防止死后被鞭尸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是双重的：一则以爱，一则以恨。赫鲁晓夫推倒斯大林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毛泽东是高兴的。他评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能想问题了。”这里所说的“大家”，其实主要是指他自己：这下他毛泽东终于可以当共产主义运动的“龙头老大”了，他敢讲话了。至于想问题，他倒是历来都敢想的。在这层意义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满心感激。

可是在另外一层意义上，毛泽东不仅不喜欢赫鲁晓夫，而且非常痛恨他：因为他反对个人崇拜。如果赫鲁晓夫用别的甚么名目否定斯大林，毛泽东也许就不会那么恨他了。毛泽东是一

个打从骨子里喜欢个人崇拜的人（当然是对他的个人崇拜）。因此，他在中共八大上，对刚刚开过的苏共二十大，做了一下姿态，应付了一下门面以后，很快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是违背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理论的，并且提出有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历来是独裁统治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独裁者实行统治的一个重要工具。反对个人崇拜，就是反对独裁统治，就是反对独裁者本人。这是毛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都耿耿于怀。

同样，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同中国文革的关系也有二重性。一方面，他们惊醒了毛泽东，让他清楚地意识到，独裁者身后会有人鞭尸。斯大林便是前车之鉴。如果不想（当然不想）改变独裁制度，而又要避免被鞭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一切可能的鞭尸者、“睡在身旁”的大大小的赫鲁晓夫早早地消灭掉。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消灭“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免死后被鞭尸。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又被毛泽东用来充当发动文革的“稻草人”：他用赫鲁晓夫的恶名来胁迫人们跟着他去反对和打倒他所要反对和打倒的人。从一九五六年起，到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毛泽东已经把赫鲁晓夫妖魔化了十年，在中共党内外，赫鲁晓夫早已被认定为一个背叛马列主义，出卖社会主义，投降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十恶不赦的、天字第一号的坏人。现在，中国党内也出了这样的坏人，岂不应该赶快起来反对吗？实际上，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所宣示的逻辑，也是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参加文革的人的思维定势。毛泽东狠命批判赫鲁晓夫如何如何，其真实意图，就是要利用赫鲁晓夫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赫鲁晓夫早在文革发动前两年已经下台了，反对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不过是一种姿态，是做给中国人看的，尤其是做给那些可能同情和支持赫鲁晓夫的人看的。

◇ 夺权，是文革的直接起因

毛泽东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身后之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比身后之事更加紧迫的，是眼下的大权不要被篡夺。他对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认为相当大部分的权力已经不在自己手中。据说，三分天下，他只有其一。如果生前大权就被篡夺，死后便可想而知了。为了保住大权，他曾经发动了反右派、反右倾、反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可是，他认为，这些都没有解决问题。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形势反而更加严重了，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防止他们篡夺最高权力，他不惜以七十三岁高龄之躯，抖擞精神，发动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他们彻底打倒，把已经旁落的大权从新夺回来。简单地说，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直接的起因。夺权，是文化大革命贯穿始终的主题。实际上，一开始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就夺了中央的权。文革小组，名义上隶属于中央常委之下，实际上隶属于毛泽东一人之下。接着，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面夺权。待到该打倒的都打倒了（其实，不该打倒的也打倒了）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便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真是昏了脑，竟把台湾给忘记！记得当时特别发行了一张邮票，就叫“全国山河一片红”，结果大出洋相，急忙收回来。这张邮票，后来成了高价抢手货）。

总而言之，文革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夺权运动。

夺谁的权呢？夺第二把手、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权。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已经在全国上下的党政部门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到处都有他的“代理人”，只有军队系统有林彪替他管着，尚可放心。毛泽东之所以要把全国的党政机关统统砸烂、打碎，目的就是要将刘少奇连同他在各地各部门的“代理人”一起打倒。令人费解的是，作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二号人物的邓小平，居然幸免于难。其实，毛泽东本来就没有要打倒邓小平的意思，这从后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对他网开一面，留有余地，可以看出来。当时把他放进刘少奇的“司令部”，不过是让他陪绑而已。

光刘少奇一个人，怎么能成一个“司令部”？邓小平当时是总书记，在工作上和刘少奇联系较多，把他同刘少奇捆在一起，正可以壮大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声势，以表明问题的严重性。这样，邓小平便扮演了半个黄盖的角色（一个愿打，一个不愿挨）。至于后来林彪也被打倒了，那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林彪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号帮凶，后来毛泽东怀疑他有二心，才把他打倒。毛泽东死后，江青也被打倒了，那更不是文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是新一轮权力斗争的第一声惊雷。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文革，无论是为了防止生前被篡权，还是为了防止死后被鞭尸，都紧紧围绕一个“权”字。毛泽东一生视权力为生命，这一点周恩来看得最透彻，最懂他的心思。有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毛泽东生病（大概是在林彪出逃以后），昏迷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周恩来俯下身子大声对他说：“主席啊，大权还在你手里啊！”研究文革的起因，一定不能忘了这个“权”字。否则，就会如堕入各种意识形态的五里云雾。

◇ 拆穿路线斗争的骗人把戏

有一种看法，显然是受了迷惑，那就是过分看重毛泽东所标榜的那些东西，甚么路线斗争呀，反修防修呀，以及诸如此类的口号，把它们都当真的了。一位哲学家曾经提醒世人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这是很对的。毛泽东打出这些旗号，只是他对自己进行的斗争所作的一种解释，是他的自我表白，是不能作为判断他真实意图的根据的。在这些堂而皇之的旗号后面，实实在在地进行着的，是权力斗争。甚么叫政治？说到底，政治就是为权力而斗争。这里没有这阶级那阶级、这党那党之分。区别只在于，在民主制度下，斗争的胜负取决于民众的选票；在独裁制度下，取决强权，特别是军队。在决定性时刻，谁手里有军队，谁就稳操胜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以来，毛泽东夺取了军队大权，从此以后，不管进行甚么样的“路线斗争”，他都是“正确路线”，而且百战百胜。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说过，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以“路线斗争”为旗号的权力斗争的历史。这是真正的高明之见。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这样看。

有没有“路线斗争”这回事呢？要说有也有。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开始的时候，最初的参加者，理想主义者居多，那时候，内部斗争往往真的是为是非而斗，即使这种是非并不像当事人想像的那么严重，彼此之间也争得很真诚、很执着。这大概可以算作路线斗争的雏形吧。及至后来，见到了权力，尝到了权力的滋味，情况就不同了。把“路线斗争”弄到性命相拼的地步，是苏共的发明，毛泽东把它推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目的当然为了争夺权力。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权瘾比赌瘾、毒瘾还要强烈，还要难解。染上了权瘾的人，如果中途不出意外，到头来都是独裁者。这在斯大林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为了保住并扩大已有的权力，他不断制造各种理论、提法和口号，以便把他视为敌手的人一个个装进去，然后宣布一次又一次路线斗争，名正言顺地把他们一个个打倒，并从肉体加以消灭。然后宣布，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莫斯科大审判，就是用这套把戏把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送上断头台的。毛泽东也是这样。所谓文革，不过是莫斯科大审判的中国版。区别只在于，中国版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花样更翻新、害死人更多，因而更残酷、更丑恶、更荒诞。

如果看不清这种所谓路线斗争的虚伪和险恶，那就太善良，太纯真了。在中国，所谓路线斗争，除了独裁者用作打击异己的工具，还是有一个巧妙用途，那就是用来进行自我辩护。不管犯了多大错误，出了多大乱子，都可以推到错误路线上，自己一贯伟大正确。可是，这一回他们遇到了难题：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而且是一次全局性的、持久的错误。即一次极其严重的路线错误。这又怎么办呢？他们自有高招：例如，被邓小平称之为“党内第一支笔”的胡乔木，就装一付可怜巴巴的样子说，“这次就不提路线错误了吧？”为甚么？

据说“马克思也没有说过路线斗争”（其实，马克思不止一次说过）。既然马克思没有说过，为甚么几十年来把路线斗争提得那么高，认为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路线斗争史？现在事情落到毛泽东头上了，“就不要再提路线错误了”。这表明，甚么路线斗争，防修反修，都不过自欺欺人而已。能用来打人的时候，是路线斗争，自己碰上了，不过儿戏而已，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我说了那么多，中心的意思，就是决不要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进人家的思维模式。这里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东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权力斗争。至于这么荒谬的文革怎么能搞起来，而且持续了十年之久，那是一个需要从文化、历史和制度背景上另行研究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被误导了几十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设法让下一代不再被误导。总结文革的意义，恐怕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我相信，当年轻的一代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不再人云亦云（确切地说，不再官云亦云）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美好起来。

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 原载《开放》杂志网站2006年5月号

~~~~~

## 【春秋史笔】

### 反思文革认清极权专制的本质

• 胡 平 •

文革过去整整四十年了。作为当年文革造反派之一员，我认为我们应当通过对文革的反思而进一步认清极权专制的本质。

记得在1969年夏天，我们几个朋友议论文革，一位老造反朋友就说：过去我们总说老保们受蒙蔽，其实我们也是受蒙蔽，受了个大蒙蔽。

不错，文革的造反运动确实沉重地打击了各级党组织，但是它帮助强化了毛的个人权力，使极权统治登峰造极。其实，毛的做法并非史无前例。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一度也发动普通党员群众揭发批判各级地方党的领导。在我看来，象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发动普通党员或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忿恨主人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因而乐于在僭主的支持下打倒主人和顶头上司，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借此加强自己的个人权力。

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

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感到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中共在全盘否定的名义下禁止对文革的清理，一部文革史已经被搞得混乱不堪。特别是造反派，什么坏事都推在造反派身上。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澄清的。另外，文革期间的不少反叛思想，许多也是来自造反派队伍。毫无疑问，造反运动中包含有反政治迫害的成分。但我们不应夸大它的份量和意义。在整个造反运动中，反迫害所占的比重有限。另外，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真正的保护人权也还毕竟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造反派不仅仅反对当权派压制群众，他们还积极地揪斗走资派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众所周知，在被揪斗的走资派中，首当其冲的是彭德怀、邓拓式的干部；在被宣布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狠加批判的各种政策和观点中，主要是那些比较务实和稍具自由化色彩的东西。造反派是以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反对政治迫害的，是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保护自己打击对方的，结果就成了为毛的例如三面红旗一类罪恶背书，倒去批判那些在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上比较务实的和稍具自由化的东西。

不错，毛刘都是坏蛋。我们既然有机会借毛这个坏蛋之力去打倒刘这个坏蛋，何乐而不为？但问题是，毛之所以要打刘，不是因为刘的坏，而是因为刘的不太坏，而是因为刘还有一点好。毛是因为刘搞了点修正主义，多少纠正了点自己的错误，使中国走出大饥荒，才对刘无比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造反派助毛打刘，是帮助大坏蛋最坏的方面去打击小坏蛋最不坏的方面。不错，有一些造反派只是打起毛的旗号反迫害，他们只是打毛的旗号去打击压制他们的那些当权派。但是你只要打的是毛的旗号，你就不免被毛所利用。保守派同样打毛的旗号。有没有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呢？有，但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无非是有点实用主义罢了：对于毛的指示毛的政策，对自己有利的就多讲，对自己不利的就少讲或回避。但大多数人还是承认毛的权威的。这当然是过去十七年洗脑的结果。这正是毛敢于发动文革的本钱。不错，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之后，越来越多的群众和干部从早先对毛泽东的热烈崇拜中清醒，但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又陷入对毛泽东的强烈恐惧。这就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极权专制，因为极权专制的本质就是恐惧。

文革中，各派都打毛的旗号保护自己，都打毛的旗号打击对手。于是毛的权力就达到顶峰。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哪派赢得上风，哪怕占据了中央权力，也不敢公开打出反毛的旗号，因为他们担心一打出反毛的旗号就会立即招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谁还能当赫鲁晓夫？谁还敢当赫鲁晓夫？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如意算盘。他几乎取得成功。今天我们反思文革，首先就要深刻地认清极权专制的这种本质。

~~~~~

【学术争鸣】

伪劣的文革史与误入歧途的文革反思

• 刘国凯 •

在文革四十周年之际，许多人都力称对文革须作彻底反思。然而，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进行反思都须有个前提，就是反思须以史实作根据。否则反思就成了凭空臆想、盲目推断。

◇ “秘史导入”效应与制造哈哈镜

迄今为止中国文革史修编状况如何？就官方而言，仅广西修编了一部内部读物《广西文革大事记》。其它就是某些文士的个人行为。如王年一的《大动荡的年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这些标榜为文革立史的书籍，其实史料片面、行文粗糙。基本上是按照中共高层的政治意图对历史作相应的切割。从这类书中，人们绝对看不到文革大波中民众许多力图挣脱，乃至已经挣脱官方羁绊的抗争行动。一场内容极为丰富庞杂的文革大波，在他们的笔下就成了“清宫秘史”和“全民疯狂”。另一部“文革十年史”，其作者是令人尊敬的严家其先生。只是，此书走的亦是官方路线。（此书问世早在1986年。以严家其先生的民主理念，如果是近年问世，想会有大相径庭的谋篇布局。）

除了这几本以史为名的书之外，就是某些官方名人如吴德、汪东兴、徐景贤等人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的真实性、可读性须作别论，但有一样可以断定的是，这类回忆录将更深地把人们对文革的观感导入了“清宫秘史”的死胡同。然而，文革大波决非只涉及社会上层的宫廷阴谋、名人角力。

如果说以史命名的著述和名人回忆录对人们有“秘史导入”效应的话，那么更多的文学作品就在制造哈哈镜，对文革大波作了极端歪曲化的描绘。在这方面，正直的文革史学家宋永毅先生作过相当完整的统计。他指出自1976年10月到1983年“把‘造反’作为一个罪恶的公共贬义词的文章，共有1229篇之多！”

当今流行于世、认为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系属“全民发疯”的观点，以及造反派是林彪四人帮的走狗、是文革浩劫的制造者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是来源于这些文章的误导。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文章并不都是官方直接手笔，有许多系来自独立文人的笔下。甚至连我们尊敬的巴金老人都有所涉及。如果说在中国国内有中共官方有形无形的压力和导向的话，那么在海外应不致有曲意迎奉的动源，可为什么在海外一些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上亦可常读到这类文章呢？中共对海外华人报章固然作了相当的渗透，但那些文艺副刊当不属中共“统战”的主要目标。合理的解释是，由于那1229篇文章产生了强大的戈培尔效应，使很多人对文革大波的了解都来源于那1229型的哈哈镜中的歪曲形象。

◇ 正直文革研究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文化大革命在1968年夏季镇压中结束后，（笔者持三年文革论）又持续有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在经年的政治清算和处决狂潮中，原来流落民间的文革书面文字资料大都在持有者的恐惧中销毁、失散。中共当局当然掌握着一定数量的书面文字资料。但这些资料被共产党视为国家机密，不准外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正直的研究者想修编不落当局话语系统的独立文革史，恐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999年，海外文革史学家宋永毅为修编文革史曾专程回国收集文革资料，不料被中共逮捕。罪名是窃取国家机密。后幸得西方学界大力声援救助，共产党在将他羁押近一年之后不得不释放。于此可见中共政权对真正文革史的修编怀有多么大的戒心。共产党深知，只有将历史真相继续掩盖下去，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继续扭曲，他们主导、误导文革反思的大计才能得以成功。

◇ 文革反思成为无源之水误入歧途

可见，尽管四十年岁月的流逝，使人们本来可以定下神、静下心来反思文革，但是由于中

国目前文革史修编的滞后伪劣，在历史真相被掩盖，集体记忆被扭曲的情况下，文革反思非但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更可能会误入歧途、坠入陷阱。

确实，当今民间的文革反思实际上已经被中共牵着鼻子走。最典型的表现是中共高叫要“彻底否定文革”，民间也高叫要“彻底否定文革”。

共产党的“彻底否定”是怎样的否定呢？是一个清醒的否定。是有具体取舍的否定。它一是要否定毛泽东那种把党内高层斗争公开化，借助民众的力量斗倒党内异己的作法——这种作法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其内容与名称几无逻辑关系。二是要否定民众在那场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大波中对中共政权的冲击。在这“彻底否定”的共识下，共产党痛定思痛下了两个决心。决心一是彻底摒弃毛的作法，致力于党内斗争党内解决，绝不闹到社会上去。决心二是对民众保持高度的警惕，严防民众中有人窥伺时机，采用文革大波中那种群众集会、游行示威、绝食静坐的方式向中共政权作抗争。共产党把这个“方式”称之为应予彻底否定的“文革那一套”。至于共产党在文革时期镇压屠杀民众的“那一套”则在实际行事中不动声色地继承下来。

民间的“彻底否定”是否定什么呢？是不清醒的、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否定。否定毛发动“文革”；否定“破四旧”；否定“红海洋”；否定“红色恐怖运动”等等。这些当然否定得对。然而同时，又否定群众在文革中的反官僚行动，理由是反官僚不反体制就毫无意义。否定民众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的行动，理由是这个行动以承认共产党的政治制度为前提，因而是反动的。否定群众维护争取应有权益的斗争，理由是这一斗争以毛泽东的恩准为凭藉而无正义可言。否定主张民众直选行政长官的文革新思潮。理由是它与美英民主来比是太落后了……更有甚者，把文革时期官方和官方的延伸物——保皇派的暴戾行为移花接木到造反派群众身上，藉此把文革时期群众的反抗行动与“破四旧”、“红色恐怖运动”等量齐观为疯狂、暴乱而予以“彻底否定”。可见民间的“彻底否定”客观上附和了共产党的政治谋略；自废了民众向共产党抗争的“武功”。

◇ 对“人民文革”应予以肯定

笔者以自己数十万字的文化史著为据，提出将文革分解为“官方文革”、“人民文革”。明确民间的反思应去否定“官方文革”。而对“人民文革”则应予以肯定。

文革史的编撰基本是史学领域里的事。文革反思则有着重大的现实政治意义。但是，由于文革反思须以文革史为基础，故文革史的编撰也间接与现实相关。文革史编撰的滞后伪劣除源于共产党的强力运作外，也与中国当今文士的素质有极大关系。

翻阅几本所谓的文革史著，不觉感慨万千。这些号称数十万字的著述竟然连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的第二次反右，和1967年2、3月遍及全国的镇反运动都不予提及。这是偶尔的疏忽吗？当然不是！真实缘由是什么呢？是邓小平及镇反运动的实行者、或他们的继承人都位高权重。而且这位高权重的人们正在给作史者以优渥的待遇。

这使人不禁想起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小故事。公元前548年齐国国君与大臣崔杼之妻私通。崔杼愤而杀之，并另立国君。齐国史官伯据实记录：某年某月某日崔杼弑君。崔杼见文怒而杀之。伯之弟仲继书“崔杼弑君”。崔杼再杀之。其弟季继而再写。有南史氏闻崔杼已杀两人，推想弟季亦将遭不测，遂毅然进京，继死难史官兄弟之业。半路得知崔杼不敢再杀弟季始折返。

看看中国古代文士之傲然风霜、铮铮铁骨，再看看当今中国文士之趋炎附势、奴颜媚骨，

不觉仰苍穹而长太息！中国文革史之滞后伪劣，文革反思之误入歧途，中国当今某些文士责莫大焉！

□ 原载《动向》2006年5月号

~~~~~

【一家之言】

趁机造反——纪念文革爆发40周年

• 郑 义 •

转眼之间，文革竟过去40年了。

这个大脑被切断电源，嘴被贴上封条的民族，对那场政治大动乱的理解和评价，仍然是文革结束后统治者钦定的那些教条。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社会（包括民间社会）的主流思想。文革中被“造反”运动一度打倒的共产党权贵们，不仅对起来反抗他们的民众采取了即刻的血腥的报复，而且利用从党决议到报刊宣传的一切机会和手段，“彻底否定”文革。文革结束后这30多年的历史，就是官方意识形态在文革研究领域“全面专政”的历史。少数民间思想者提出，文革不能彻底否定，要从这个浩劫中分离、抢救出有价值的部分。但是，这种思想始终受到官方的敌视。因为文革中有价值的部分，正好是官方最仇恨的部分——人民趁机造反。

我是一位文革的亲历者，从身受迫害到参加造反，直到亲临武斗现场，经历了它的全过程。亲身经历告诉我，文革那种席卷全国各个阶层的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并非一种不可思议的麻醉与疯狂。近一二十年以来，中国人性的普遍堕落已是不需要如何争论的事实。文革发生于中共建政后第17年，那时，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较为人性的文化、思想、道德还没有被共产社会扫除干净。那个时期的人，要比今天的中国人更正直、温和、诚实、勇敢。官方学者很愿意把文革描写成一场大疯狂，但这是经不起讨论的。我们很难想像，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的人民在一瞬之间患了集体疯狂。文革之暴烈，自有其深刻原因。

毛泽东死后，“个人崇拜”轻而易举地被说成文革的动因。也就是说，文革变成一场宗教痴迷者的“造神运动”和现代十字军。

中国人不是笃信宗教的民族。

一言以蔽之：民众对毛泽东“无限崇拜”，主要还是因为毛号召、支持人民反抗暴政。

文革的最重要标志，是合法“聚众造反”。中国素有聚众造反之传统，但在皇上支持下聚众造反的，这还是第一次。中共夺取政权后，各种小型的动乱、抗议和农民造反就此起彼落，不曾中断，不过是始终被严密封锁，不为社会所知。“镇反”、“肃反”、“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倒行逆施，造成了极其深重的苦难，特别是那场活活饿死了数千万人的人造大饥馑，在民众心中积压了极大的仇恨。现在好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打倒党内走资派”了，何不揭竿而起？

有人说文革是“奉旨造反”，有一定道理，符合相当多青年的状态。但对于已经感觉到剥削压迫的人们，应该说是“趁机造反”才更为贴切。这里我想举一个工人造反的例子：“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以1966年10月为标志，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文革的斗争矛头从共产党的传统敌人转向各级共产党组织和官员。文革开始显示出不同于以往政治运动的特点。在这种气氛之下，一群工人成立了“全红总”。这个工人造反组织发展极为迅速，一个多月后就夺了官办“全国总工会”的权，进驻全总大楼，接管了原属于官方总工会的全部权力。江青等毛派代表人物对他们表示支持，想把这股政治力量引向毛的政敌。很快，发现工人们是在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30万人的示威游行，公开亮出自己的口号，其中有“誓死砸碎一切剥削制度！”这简直就是对共产专制的直接挑战。这个工人造反组织最后发展成在全国多省都有分团的全国性组织，引起了最高当局的惧怕。自成立算起，不过3个多月就被当成全国第一号“反党组织”加以镇压。在各地，都有工人领袖被捕。刑期很长，几位主要领袖分别为20年、15年、10年。

许多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士，从与官方相反的方向否定文革。他们说民众只知道巴黎公社，而不具三权分立等现代民主思想，并以此来否定其反抗专制的意义。这是很遗憾的。时至今日，中国大陆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还要在现有法律框架中进行，只能说“维权运动”，尚不敢称之为“民主”运动，更不敢挑战极权制度，提出诸如“三权分立”的口号。如此，怎么能苛求40年前的先行者？由于历史条件之限制，文革造反派不可能提出三权分立等完备的现代民主思想，但他们所向往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已然构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致命威胁。

把文革简化为“个人崇拜”、“造神运动”，也使我们看不清“红海洋”底下人民的反抗。倘若今天中共最高领袖照搬当年毛泽东那些口号，指出圈地抢钱的那些共产党高官，就是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的特权阶级，号召人民起来造反，如果是这样，试想民众会作何反应？

还会造反吗？——为什么不？当然要趁机造反！

还会搞大字报大批判吗？——不会了，抓住贪官污吏当场处决！

还会“誓死保卫某主席”吗？——当然，如果他支持人民并遭到党政军既得利益者的围攻和威胁！

如果是这样，难道也是因为“个人崇拜”吗？

拨开“个人崇拜”、“奉旨造反”的表面现象，激动过千百万民众的文革，存在著自己真实而深刻的动因。其实也很简单，文革中的造反，是毛和人民的一种互相利用。毛有意识地利用人民对共产党的仇恨，把矛头指向他的政敌。人民无意识地利用毛的崇高威望，一举推翻了共产党大小官吏。然后，毛再利用军队镇压了人民，重建了一个清除了政敌的共产党。毛当然是胜利者，但人民也可以从失败中看到自己争取自由的伟大的力量！

我始终认为存在“两个文革”，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

有时候，简单化有利于暴露本质。

2006年春

□ 原载《观察》网站

~~~~~

【各抒己见】

“人民文革”不存在

• 元 旦 •

“人民文革”之议，开始只当是开玩笑，觉得这样一个凭空杜撰的伪命题，不值一顾。近日上网，偶尔查阅这个题目，竟然是个热点，赞成反对都不少。由于涉及民主自由，禁不住也想凑个热闹。

刘国凯介绍他的核心观点：

我对“人民文革”起了一个“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名字……“人民文革”……是超阶级的“人民”的，……是政治上如何解放人的问题……在它的最红火时刻，除第4个版本中的那些一贯可怜的人（当时叫“地、富、反、坏、右”）以外（大约占当时中国大陆总人口的5%）几乎可以说所有的人都获得了批评、批判政治当权派的权利，获得了在“一个鼻孔出气”的基础上的人的自由结社权，获得了散发挥发性言论的自由权利，并且用大字报的方式获得了事实上的“出版”言论的权利，……世界上第一流的“权利清单”

逻辑不大清楚，把5%排除在外，还谈得上“超阶级”吗？

对人民这个概念的解释，正是专制与民主的主要分歧：专制“排他”，民主“容他”。把一部分阶级、种族、宗教、团体、思想……排除在人民之外，正是专制社会的基本特征，常见的口号是：“消灭人民的敌人”。而民主的真髓，则在于承认反对派的权利，公认的原则是：“我只能和这个混蛋共存。”

不知刘国凯理想中的民主社会准备如何划分这个5%。

人民这个词本是中性的，指谓域内所有的人，无所谓好坏。把一些历史事件冠之以“人民”的称号，并不能说明事件的性质，只不过表明了参加者的众多。从文革参加者的比例看来，人民的确占到了95%以上，说是人民文革也不为过。但在从毛泽东到现在的民运人士那里，“人民”已被赋以褒扬的意味。新华门内“为人民服务”的牌坊宣示着执政的理由，而“人民文革”论者则给造反派戴上了“民主”“正义”的光环。然而谁都知道在这个历史事件中，人民是协从，不是能决定事件性质、色彩的主导因素。如果仅从参加者所占人口比例而言，毛泽东的文革就是“人民文革”，而希特勒的纳粹就是“人民纳粹”，斯大林的大清洗也是“人民大清洗”，都是：朕即人民。

明知必须“一个鼻孔出气”，还要称之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权利清单’”，匪夷所思。刘国凯又准备为中国民众设计一个什么样的“鼻孔”，让大家跟着“自由”呼吸呢？

刘国凯“人民文革”最根本的根据在于他不断重复强调的一句话：

“文革中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斗争”。

据我文革中的所见所闻，没有一般的、原则性的反歧视、反迫害，都是在承认“歧视”“迫害”，也就是承认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反对把自己作为对象，认为是搞错了。

这样的反抗斗争不反对体制，客观上，反倒是确认了非民主的现行制度。文革中“专政”的原则被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实际的迫害、歧视也到了顶峰。没人否定迫害、歧视的专政，只想着自己能逃出火坑，或者把别人推进去。

“镇压阶级敌人天经地义，但我被错划了，整我的他才是真正的阶级敌人。”

如此而已。

刘国凯举出湖南某组织的一些主张作为“人民文革”存在的佐证。但他们所谓的“红色资本家阶级”的说法，与毛泽东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主义者阶级”毫无二致，重提“巴黎公社”“普选”主张，本身就带着远比巴黎公社鲜明的阶级性。早期共产党领袖也是选举产生，造反派头头大多是派内普选。这些选举事先把某个或者某几个阶级排除在外，又谈何民主？这些个别的群众组织具体情况不明，难以断言，仅从所介绍的情况，看不出有哪点越过雷池，超出了专制许可的范围。

至于“人民文革”的主角造反派，无非是毛泽东招之则来，挥之即去的工具、棋子，其目的、手段、结果都是反民主的，无足称道。不过，造反派自身并没有特殊的利益，也缺乏自觉其利益的头脑，虽然干了一大堆坏事，鉴定为没有责任能力比较妥当，恕之无罪可也。对于并不复杂的造反心理，理解起来不是难事，不过是为了逃离奴隶的境遇去争取奴才的身份。这里何曾有一丝一毫争取自身民主权利的自觉，更别说是被压迫在最底层的等外人谋求解放。相反，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他们会竞相比赛手法的残酷。如雷锋所言：“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这就是所谓“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

还有更离奇的说法：“最终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价值——派性”，甚至拿去与民主国家多党制比美，似乎中国到了文革才好容易产生了“派性”这份民主价值。

民主国家的政党必须是独立的，听命于政党之外的某个至尊，就丧失了政党的资格，这样的政体与民主何干？

至于派系斗争我国自古就有，真不必去西天取经。两派围着皇帝争权夺利，是说书人早就翻烂了的话题。分派和派争是自然的，对于皇帝也是必需的，没有派也要制造出个派来，以便于利用操控。毛泽东的这类手法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我曾经是个造反派，单位里还算得上是个元老，对当年活跃分子的心态可谓再熟悉不过。眼睛都望着北京，关注着中央的动态，从最高指示里，从中央文革首长的只言片语间揣摩圣心，生怕迎合的不是地方。表忠心的拍马竞争是派头头最重要、最关键的工作，一巴掌拍到马蹄上，首长的一句话即可决定成万人派系的存亡。五十岁以上的人们应当都记得，深夜爬起来敲锣打鼓迎圣旨，以及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首长讲话号外的种种场面。哪里有过一点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迹象？而毛派要使用奴才，则不但会宽容而且要利用并挑起派性斗争，这难道不是文革中派性争斗的实质吗？明明是奉旨造反，如今非说是民主先锋，把这类毛爷爷阳光下的“过家家”当作什么“最终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价值”，只有当年打群架的孩子们之中特别有想象力的人，才能产生这样的幻觉，让所有被夸赞的造反派坠入五里雾中找不着北。

毛泽东动员老百姓反对自己治下的官僚机构，的确堪称前无古人的创举。为了反对政敌，他开放了言论、结社等形式上的自由，却早已规定了方向和范围，目的在于达成更严密的专政以打造更完全的万岁天下。这些民主现象不过是手段而已，四六年对蒋介石用过，五七派对右派用过，文革中再用来对付刘少奇，早已是轻车熟路。古今中外崇尚极端的时期，无一例外都是专制的顶峰，并且都是不择手段，包括民主的手段，而且一定比民主更“民主”，超“民主”。但是，“人民”解放的过了头，无法无天，对“敌人”压迫也就更沉重，暗无天日。大批判、大字报、大串联、大辩论，四大皆空，都是专制的手段。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谁见过一篇地富

反坏的诉求？震耳欲聋的喇叭声中，可曾有一丝弱势群体的呻吟？四大只造成了更加威压、排他和不容忍、不妥协的炎凉世态。事实上，造反派不过是混乱时期专政权利的补充和扩大，合法、非法的手段随便用，对民主的压制比常时的专政机构更严酷、更彻底。

大概有不少人对专政的原则怀有疑问甚至反感，但是不可能提出，提出了也不会有几个人听见，立刻就会有人封住他们的口，直至肉体上消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文盲，这点识别能力也早就毕了业。真正的民主要求都是反革命，没有藏身之地，成不了气候，其规模、深度、理念都不足以称得起异端。

的确有一些对体制的反抗。笔者也认识几个地主的狗崽子，其中一个知道有货真价实的反革命组织，都是5%以内的人，他想去参加却没来得及，走到那里看到的已是取缔、死刑的布告。我的一位亲戚是黑五类，参加过反动组织，结果被判刑。这类毫无希望的人的反抗，无一例外受到最残酷的镇压。他们在文革中造反，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混乱，二是所受压迫超过以往而拼死一搏。这类偶或有之的反抗活动，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没听说过有何纲领。文革中小道消息满天飞，不乏耸人听闻的谣言，这类事却很少听说，可见影响范围之小，顶不起“人民”的称谓。而且，仅凭这样的零星个案就说存在“人民文革”不啻以点概面，以个别代普遍。亿万人中，出点这样那样的想法、做法不足为怪，其中也可能有或多或少民主、自由的追求。但要以之判定全民运动的性质，言过其实。沙堆中总有几粒金沙，也许在某人的想象里那是一堆黄金，一堆沙子还是沙子一堆。何况刘国凯的“人民文革”显然不包括这些底层以下的人。他的人民概念和毛泽东是一致的，罪人阶级不在其内。

已经过了四十年，界定文革也有了各式各样的版本，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强求一致。不过，既然是讨论文革观，而非文革中的某一具体事项，自当将文革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寻求贯彻始终、支配全局的主线。以一些枝端末节将文革分成好几个文革，何异盲人摸象？

对于文革的定义，按毛泽东的理论解释大致说得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争，主角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派与资社混合的刘少奇、邓小平派。这场路线之争既非始于也非终于文革，从建国起直到现在都是我国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熄灭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都是在文革以前提出的，毛泽东则对抗以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革对此一脉相承，矛盾变得更尖锐、更深刻、更广泛，内容却没有质的变化。文革之所以特殊，主要在于表现的形式，1、集权于毛泽东一人；2、党内分歧公开；以及3、他领导的群众运动。文革随毛泽东陪葬后，守株待兔等来了胜利的邓小平即全面推行修正主义，废除阶级、改革开放、承认私有、终止领袖终身……。说邓小平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似乎不算冤枉。文革后的这些发展，为民主思想的扩大创造了一些条件，却也从反面印证了毛泽东的警告。

另一种观点把文革看作是党内争权的派别之争。三面红旗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认错的屈辱，大权旁落的危机，赫鲁晓夫昭示的死后噩梦，使他决心搬倒刘少奇，安排可以放心的接班人。继承问题也的确是文革中各种斗争环绕的中心，和历史上皇朝传位的血腥场面维妙维肖。前半是倒刘少奇，立林彪，以致不顾常识地将继承人写进了党章，结果一个大马趴栽进了蒙古，落得个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老人家仍勉力支撑着要选择一个忠于“人民”的好接班，终究是力不从心，老眼昏花，看谁都成了重影。王、张、江转去转来，邓小平几起几落，最后落了个“你办事，我放心。”如此惨烈的派系角逐，争权争位的动机明如白昼。

世间之事复杂万端，看作是两种矛盾的复合也未尝不可。争权位可说是为了争路线，争路线也可说是为了争权位，时而一分为二，旋即合二而一，此起彼伏，主次难分，各种各样的其他矛盾都被挤得没了露面的机会。除了路线和接班，再也找不到文革的其他主题。文革的中心

是党内斗争，人民不过是被毛泽东拉来跑龙套而已。

文革由毛泽东发动，而且自始至终是由毛泽东派主导，因此可以说文革就是毛泽东的文革。虽然结果是邓小平胜利了，但邓小平在文革中不占主导，不是主流，文革不能冠以他的姓名。其他文革就不值一提了，否则，你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革。

文革中不存在民主问题。反右以后，民间民主已经荡然无存，罢免彭德怀，党内民主也盖棺封印。文革时的对立双方都没有民主的思想，社会上也没听到过民主的要求和主张，更没有实际的民主行动。民主、自由仅存在于部分人们心中，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注目焦点，而且，高压之下，也没有表现的机会。

从全社会范围讲，文革的目的在于加强专政，从而巩固公有制。实行过程中也确实把专政发展到了极端。所谓“人民文革”不存在，既没有形成值得一提的对抗势力，也没有广泛传布的对抗思想。即便是文革晚期的“四五运动”，也不存在任何民主因素。周恩来自己就是专制的一部分。参加者也是只否定恶的专制，却希求“好”的专制，没有提出民权要求。与历史上为清官送万民匾毫无二致。文革对于民主的积极作用，仅在于它的黑暗、无理，这使更多的人对文革，并进而对专政和当局产生了怀疑、否定的认识。

“浩劫”“动乱”，说的不错，对于那个时代的过来人，用不着任何解释。但是作为官方结论却不够严肃，这个说法对文革的性质没有说明，措辞也带有明显的感情因素。

文革是毛泽东主要的生平事迹，也是共产党的一段重要历史。对文革的评价，直接关系到对毛泽东的评价，同时影响到对党的评价。邓小平恨透了文革，却没有请毛另觅新居。他很理智地将毛三七开，因为不可能将毛与党分离，也不可能将文革与“十七年”割断。他只能对文革的性质含糊其词，避而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不是神，也不是妖魔。毛泽东的轨迹是清晰、明确的，他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的方向。他的内心是圣洁还是龌龊，难以捉摸也无关紧要。他的一生行事带有强烈的共产主义理想色彩：“未来支配现在”。为了未来，他始终如一，从不动摇，不顾一切，无法无天。那份理想自有美好迷人之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真诚的信徒，其中不乏中华的优秀儿女。这份理想也涂抹了文革的颜色，红卫兵、红袖章、红旗、红海洋……，红色文革，毛的文革。

文革是非常时期，重现的可能太小，研究的价值也就打了折扣。至多只是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极端而突出的非常时期，既没有产生新制度，也没有萌发新思想。要说有什么积极意义，也许是比较充分地暴露了社会制度的问题。人们已经可以不单只从书本和伟人语录中，而且从历史 and 实践中认识共产主义的本质。应当把建国后直到今天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从中找出合理的通往自由民主的途径。

题外的话：

王希哲批评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论，认为他把文革与其后的民主运动孤立了起来，于是重新定义如下：

“人民文革，即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中异化，产生和发展起来与之对立的为争取和维护人民自己的阶级利益的运动。它的延续，发展为中国人民争取人权和民主制度的政治运动。”

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人民争取人权和民主制度的政治运动”是从文革才开始的。这和

被他批评的对象有着类似的倾向。刘国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把文革孤立于历史长河之外。王希哲“后有来者，前无古人”，无视文革以前的历史，把文革尊为民主的开山太祖。历史的真实是这样的吗？。

中国的民主运动，至少在孙中山时代就已经开始。一百年来，辛亥革命、讨袁、五四运动……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运动，有主张、有纲领、有行动，而且确实推翻了皇朝帝制，建立了初期的民主政体。建国后的右派，虽然势单力孤，迅速失败，毕竟也有人喊出了“三权分立”“轮流执政”“新闻自由”等民主主张。民主进程不能令人满意，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谁也不能抹煞民主先贤可歌可泣的奋斗。

反观文革，与民主、与民主派有关的事，除了顺便镇压死老虎的“历史民主派”之外还有什么？深藏在部分人们心中的民主愿望不是没有，不是不强烈，但尤其在文革时期，民主早就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民主等于反革命”，已经是普及民间保身护命的基本常识。新的现行民主派完全没有滋生的土壤。借助于群众专政，文革对一切可能的民主要求进行了空前成功的封杀，写下了我国民主运动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人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有意无意地充当了帮凶。

文革在我国的民主运动史上，没有位置。

2006-3-23 于东京

□ 原载《议报》第243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